

抗战时期台湾接收干部的培训及其影响

赵庆华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3000)

摘要: 开罗会议明确了台湾在战后的归属之后,国民政府开始启动具体收复台湾的计划。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台湾接收干部的培训。为此,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在重庆沙坝坪复兴关成立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培训台湾接收干部。该班选拔政策切合社会实际、选拔标准严格,干部年龄层次以中青年居多,干部专业以民政、工商交通、财政金融、农林渔牧等实业方向为主。光复后,该班部分干部研拟接收政策、成立台湾重建协会,其中104位接收干部赴台参与接收,且一半以上的接收干部留在台湾,在其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做出较大贡献。

关键词: 抗战时期;台湾接收干部;培训;影响

1943年11月,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联合发表《开罗宣言》,指出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岛等将于战后归还中国,明确了战后台湾的归属。^[1]此后,国民政府开始对东北、台湾接收干部的培训工作进行研究、部署。1944年4月17日,正式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简称“台调会”),开始台湾接收的各项筹备工作。^[2]1944年10月16日成立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台训班”),培养台湾接收干部人员。对此展开研究的主要有两位台湾学者。其一是空中大学人文学系蔡相辉,其二是东海大学刘明宪,他们可谓研究台训班的先行者,但其所引资料及观点不无可商榷之处。蔡相辉《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初探》一文,认为“国民政府办理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是一项正确且成功的措施,对日后台湾的接收、各项行政的顺利运作,都有正面的贡献”^[3],但并未对国民政府复台人员的训练模式、人员构成、师资力量等进行深入分析。与蔡氏相反,刘明宪对台训班几近持完全否定之态度,认为台训班课程、学员籍贯及班级纪律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4]。刘氏引用台训班学员唐秉玄在受训期间的日记,从“二二八事件”出发,认为台湾接收过程中的混乱场面一定程度上应由台训班成员承担责任,然而并未能说明台训班学员与“二二八事件”爆发的直接联系,也未举出实例证明台训班学员在接收台湾时存在腐败行为。刘文推论有“以成败论英雄”的意味,难以服人。有鉴于此,本文围绕台训班学员之组织特点、人员构成、受训内容、在接收工作中的贡献等进行探讨,以期推进学界对台湾接收干部的研究。

一、“台训班”的成立与运作

(一)成立

台湾革命同盟会(简称“台革”)作为抗战时期大陆台胞的反日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在大后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5]1942年4月10日,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常务委员宋斐如、李友

作者简介:赵庆华(1988~),女,河南新乡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国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邦、谢南光三人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请“设立台湾省政府及增设台湾参政员”。^[6]随后再次提交《台湾省政府筹备处设立纲要》及《三十三工作计划书》。《纲要》提出,台湾省政府筹备处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训练行政人员及各种高级技术人员、设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7]“台革”的这一提议成为后来中央训练团(以下简称“中训团”)台训班的原始构想。1943年9月20日,“台革”再次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在福建省省训团设立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8]并拟定《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之设立办法》。^[9]随后,该提议被送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1月1日,秘书长吴铁城致电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请其办理此事。^[10]但福建省训团最终并未办理此事,原因在于1944年台训班转入中训团。国民政府将台训班之主办单位从福建省训团提升到中训团,显示出对复台人员筹备工作的高度重视。

1944年10月6日,台调会、中训团及各部门主管人员进一步议决《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学员甄选办法要点》。10月14日,拟订《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学员招选办法》及《各机关选送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学员注意事项》。10月22日,台训班正式成立,学员人数、组别、选送学员资格、考核等项也最终确定。^[11]

其中,选送学员资格如下。学员须在25岁以上45岁以下,身体强健,且须具备下列资格之一:高等考试及格,服务成绩优良者;曾任荐任职以上职务或相当职务,服务成绩优良者(最好就现任荐任职或委任一级人员中选送^[12]);曾在专科以上毕业,服务成绩优良者。服务职务以直接与各组有关者为限(例如民政组学员以服务民政者为限)。所习学科亦以与各组直接有关者为限(例如财政金融组学员须曾习经济商业;农林渔牧组学员须曾习农林等)。仅台湾人员之致力革命著有成绩者必要时资格得从宽。^[13]各机关在选送之前,须得被选送者之同意。^[14]训练时间为四个月。^[15]

从学员选拔过程及第一期学员原任职务的资料可知,第一期结业学员共118人(共招收120人,其中1人患病,1人因请假过久被退训,实际毕业学员为118人)。^[16]第二期还未开训,抗战已取得胜利,因此该班仅办一期。

(二)运作

1940年7月6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决定推行行政三联制,将行政管理的设计、执行、考核三个环节紧密连接起来。行政三联制下,中央设计局是主持政治经济建设计划的设计及审核的最高机关,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是考核检定设计方案的实施进度、考核党政机关经费人事的最高机关。而国民党五院、国民党中央各部会、地方各级政府和党部则成为纯粹的执行机关。^[17]“台训班”是由“中训团”和中央设计局“台调会”共同负责、“双线共养”的组织,“台调会”和“中训团”各有分工,“台调会”主要负责组织筹划,“中训团”负责训练。

1. 中央设计局“台调会”组织筹划

中央设计局于1940年10月1日在重庆成立,1948年5月结束,隶属国防最高委员会。^[18]为筹划收复台湾事宜,1944年4月,中央设计局依照组织大纲第十三条规定设立“台调会”,^[19]并制定“台调会”组织简则及编制表、经费预算书。^[20]由此可知“台调会”是“中央设计局”的下属机构。8月,蒋介石令“台调会”着手准备培训台湾接收干部:“关于收复台湾与东北之准备工作,应先从训练与储备干部着手”。^[21]自此,“台调会”开始台训班的组织设计工作,主要负责接收干部需要的文化研究资料、研拟课程大纲等。

第一,研究参考资料的寻获。台调会成立后,主任委员陈仪曾多方借调资料作为台调会及台训班的研究参考资料。他曾向台湾党部主委萧宜增^[22]、台籍志士黄朝琴^[23]及李万居^[24]、组织部长陈果夫^[25]、台湾革命同盟会李友邦^[26]、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27]、福建省主席刘建绪^[28]、朝阳大

法学院院长孙晓楼洽借台湾资料^[29],并派台调会专门委员洪孟博赴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研究院战地党政处借阅有关台湾资料。^[30]此外,台调会还委请时任外交部长宋子文向驻美大使魏道明代寻台湾资料。^[31]

第二,训练办法及课程设计。台调会兼任委员黄朝琴拟定《对于台湾干部训练办法之意见》^[32]及《台湾行政人员训练班课务实施计划大纲》,作为台训班开班运作及开设课程的参考。^[33]此外,他还致函中政校副教务主任王慕尊,延聘该校教授作为台训班师资人员。^[34]

2.“中训团”代为训练

关于台训班行政、教务工作的分配,《东北及台湾党政干部训练办法》明确规定:“各班一切行政均由中训团办理。关于教务,必要时,东北调查委员会、台调会得派员参加之”。^[35]可见,中训团负责“台训班”的一切行政及教务。“中训团”正式成立于1938年3月1日,直接隶属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是国民党负责党政军人员的训练机构,下设各种训练班,培训时长为1-6个月不等,自1939年3月1日第一期至1944年4月30日第三十一期结束,共培训23752名学员。^[36]台训班被列为党政班第三十一期,属独立中队。^[37]

查阅《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可知,中训团具体主要负责台训班学员考试办法的订立^[38]及学员的推选、考核工作。1944年11、12月间,台革、国际问题研究所、教育部、财政部、行政院敌产处理委员会、交通部等部门向中训团积极推荐合适的人选参与训练。^[39]而中训团在训练期间还曾向台调会借调其专任委员方达观、宋斐如等协助培训事宜。^[40]由此也可看出中训团与台调会就台训班的运作事宜而展开的合作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担任中训团教育长、行政院秘书长的陈仪同时还兼任台调会主任委员及台训班班主任。这种特殊的人事任命更便于台调会与中训团就台训班筹划运作事宜进行协调、合作,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作为中训团教育长的陈仪还代表中训团为台训班延揽师资,请蒋廷黻为台训班讲授共同必修科目。^[41]较诸中训团其他党政班,台训班由中央训练团和中央设计局台调会“双线共养”,是因应抗日即将胜利的时局需要。这种组织结构意在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力量、资源为复台工作做准备,进而使台训班在研究资料、师资等方面获得多方协助,大大提高台训班的运作效率。

(三)学员来源及课程设计

1.封闭的招生体系

根据档案记载的学员选拔过程及台训班第一期学员原任职务资料,台训班学员来源及人数分别为:政府主管机关50人,党政机关29人,地方行政机关27人,教育研究机构7人,原来无职务者5人,分别占比为42%、25%、23%、6%、4%。^[42]

由上可知,台训班所录取学员多为中央层级机关、拥有行政工作经验的人员,且多数学员通过举荐的途径入班受训。^[43]也就是说,台训班是一个在国民政府行政体系内招生的训练班,是一个相对较为封闭、不面向社会招生的训练系统。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对复台工作高度重视,故对未来参与接收台湾行政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极高,需要其具有比较丰富的行政经验;另一方面,台训班是由中训团代训,故其学员选送沿袭中训团其他党政班的做法。

2.切合实际的课程设计

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台训班课程内容的设置以1944年9月27日黄朝琴呈报的《关于台湾干部训练班训练办法之意见》为主要依据。《意见》对编配课程原则、共同讲授课程、分组讲授科目、撰著论文四方面提出详细建议。^[44]

时间分配方面,台训班总训练时间为4个月共17周,除最后一周学员须结束课业不计外,

全部时间为 16 周,每周 48 小时(每日 8 小时),共计 768 小时。其分配情况如下:共同讲授时间(含预备时间)288 小时;党义研究时间 60 小时;分组研究时间 430 小时;精神训话、临时讲演、党务活动及其他活动课外举行,不占用总训练时间。^[45]据参与过中训团其他党政训练班的学员回顾,中训团十分注重国民党党义等的研究训练,训练课程有“精神讲话”“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总理行谊”“党员手册”“唯生哲学”等。^[46]曾参加中训团高级党政训练班的醒予回忆称,课程安排如下:总裁精神训话 24 小时,“革命”哲学 30 小时,“革命”方略 25 小时,中国社会研究 20 小时,现代政治学说及制度 30 小时,现代经济学说及组织 30 小时。^[47]由此可见,总裁精神训话、“革命”哲学、“革命”方略等流于形式的科目占总训练时间的一半左右。反观台训班,其共同讲授科目和分组研究科目都是具体实际内容的讲授,二者占总训练时间的 92%,党义研究时间仅占 8%。可见,台训班的训练更注重实际内容的讲授,而不甚重视党义研究等流于形式的科目。

3. 高学历的青年才俊

台训班学员共分六组,民政组 41 人,占总数比例 35%;工商交通组 19 人,占比 16%;财政金融组 16 人,占比 14%;农林渔牧组 16 人,占比 14%;教育组 13 人,占比 11%;司法组 13 人,占比 11%。^[48]其中,具备国内大学学历者 72 人,占 61%;国外专科以上学校者 17 名,占 14.4%;专校毕业者 16 人,占 13.6%;独立学院毕业者 9 人,占 7.6%;其他占 3.4%。^[49]由此可见,学员普遍拥有较高的学历。

此外,学员年龄分布情况如下(笔者自制):^[50]

年龄段	26~30 岁	31~35 岁	36~40 岁	41~45 岁	45 岁以上
人数	36	46	24	10	2

台训班学员年龄最小者 26 岁(1 人),年龄最大者 46 岁(2 人),基本符合招选办法中学员年龄须在 25 岁以上 45 岁以下的规定,即使年龄最大者也仅超龄 1 岁。所有学员平均年龄为 34.3 岁。显而易见,台训班是一支由青年才俊组成的队伍。

二、台湾接收干部的作用及影响

青年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在历史的关键节点,面对国家、民族赋予的重任时,往往容易被激发出无限豪情壮志。这些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的青年才俊,在复台重任首当其冲的时局之下,洋溢着为祖国效劳的热情与忠诚:“吾人赴台工作,责任任巨,其成功与失败,不仅关系个人之事业前途,且足影响国家之地位,是以吾人必须具忠诚为国之心与建设新台湾之志,共同经营,力求有成。惟斯土斯人,远非国内普通地区可比。若不能精诚团结,事业相助,互攻错失,互勉廉守,恐各个力量,难尽其功。故请于赴台之先,由同学会制定信条共同誓守,则不仅可坚定各人之意志,且可示吾人新作风于台胞之前,亦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51]为此,该班同学会立下赴台接收应坚持的原则:“余誓以至诚,参加赴台接管工作,愿与诸同学团结合作,坚守下列四项原则:一、亲爱精诚;二、互助合作;三、砥砺品德;四、清廉自效。如有违背斯旨,愿受同学会共同决议之制裁。”^[52]实际上,多数学员在受训前即已有不错的工作待遇,学员毅然做出赴台的决定,无疑体现出他们对复台工作的一腔热忱与崇高之志。培训结束后,台训班学员主要在如下三个方面为台湾的接收和建设做出贡献。

(一)研拟台湾接管计划

台训班学员于1945年4月22日毕业,此时台湾还未光复,故大部分学员仍回原机关任职。台调会为掌握部分人才以备不时之需,获准在中训团设立台湾研究部,从台训班选拔27名优秀学员留部工作一年。^[53]在27名留部研究者中,23名愿意长期研究,经费由中训团负担,酌发生活费,4名由原机关保留原薪。27名研究者分为五组,每组人数视研究问题范围而定。研究工作分两个步骤进行:一,完成以前工作,将以前各学员提出的报告加以整理,以供台调会参考,如仍有问题则作成结论。二,台湾法令研究,辨明何者违反三民主义,何者优长,最后作综合精详研究,草拟补充将来在台湾施行的法令。

(二)参与台湾重建筹备事务

在台训班训练结束、台湾行将光复之际,由柯台山等台籍志士提议,台调会组织推动成立“台湾重建协会”。1945年7月26日,“台湾重建协会”在重庆市中三路社会服务处联谊厅召开筹备会议,会议推举罗香林、吴建华、连震东、林云谷、薛人仰、罗克典、刘凤仪、林士贤、郭绍宗、张振汉、柯台山等11人为筹备委员。^[54]以上筹备委员几乎均为台训班成员。8月26日,“台湾重建协会”在重庆新运服务所忠义堂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协会宣言、章程,并讨论通过尽速派员至京沪及沿海各重要城市成立办事处,协助政府收抚及救济台胞等工作;优先派员随同政府接收台湾省之行政长官至台湾,协助各项复员工作;筹办《台湾日报》,展开台湾文化教育工作,并筹集事业基金、复兴文化基金;商请善后救济总署从速拟订救济台湾方案等二十余案。^[55]大会推选出的理事及常务理事成员几乎均为台训班成员。在台训班成员积极推动下,台湾重建协会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议决定推动会员成立各地分会,并决定在台湾各市设支会,各县设区会。重建协会的会务次第在全国各地展开。^[56]

台训班成员除积极参与推动台湾重建协会的事务外,还积极就台湾接收事宜建言献策,贡献自己的见解和智慧。1945年8月25日,台湾重建协会出版《台湾重建协会成立大会特刊》,刊发台训班学员的文章,为台湾之顺利接收建言献策,对重建工作提出不少宝贵而中肯的建议。^[57]

(三)参与台湾接收及建设

1945年8月台湾光复,第一批随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赴台参加接收的台训班学员主要是留在研究部工作的人,随后还有学员陆续经由各机关派遣赴台参与接收工作。^[58]台训班学员中到台湾参与接收工作者共104人,仅11人未到台湾,另有3人去向不详。^[59]这些学员在战后台湾的党政、教育、司法、财政、交通等各政府机关单位担任要职。他们凭借过硬的行政能力和丰富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受训期间获得的台湾知识,在接收台湾过程被委以重任,成为台湾重建工作的重要推手。以下为部分学员的任职情况^[60]:

姓名	经历	出处
温民凡	台湾省新竹县新竹区区长	《台湾地理及历史·卷九·官师志》
周士弘	新竹市建设局局长	《台湾时人志》
林振汉	重庆市政府社会局视察、台湾新竹接管委员会委员、桃园区署区长、新竹市政府主任秘书、华南商业银行总行主任秘书、人事室主任、秘书处 长、副总经理、台北华侨商业银行总行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世华联合商业银行常驻监察人、台北市银行公会理事、财团法人金融人员研究训练中心董事、中日文化经济协会财务委员	《中华民国企业名人录》

王一鹰	彰化市市长、四川省成都县县长、中央政治学校组长、少将研究员、新竹州接管委员	《台湾时人志》
郭铎	台湾省花莲县政府花莲市公所市长	《台湾省各机关职员录》
吴建华	高雄县政府民政局局长、军委会西南运输处工作、考试院交通部、中央工作竞赛推行委员会、台湾任公署民政处专员、主编台湾省县市行政人员手册、高雄县政府主任秘书、著有中央行政制度	《台湾时人志》
张振汉	外交部驻台湾特派员公署秘书	《台湾省各机关职员录》
	外交部驻台湾特派员公署秘书代理特派员、莆田县长、外交部派驻横浜总领事馆随习领事、副领事、台北市首任警察局长	《台湾时人志》

三、结 语

台湾接收干部的培训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做出的正确选择,它所培训的这批接收干部成为自 1895 年马关条约之后第一批重新开始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的干部人员,中国政府开始走上了重新认识、了解、研究台湾的新起点。

台湾接收干部的培训工作作为台湾光复及接收工作的一个环节,毫无疑问值得我们关注并进行深入探讨。这批接收干部随国民政府赴台接收,此后因两岸分治的政治现实而留在台湾,继续为台湾的发展建设尽心尽力。对这些接收干部进行进一步的追踪研究,并深入探讨其赴台接收及在台湾发展建设中的作用,是此项课题值得进一步延伸、拓展的部分。

注释:

- [1][2][16]秦孝仪、张瑞成:《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第35页,第44页,第138页。
- [3]蔡相辉:《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初探》,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四册)——台湾光复与建设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228~245页。
- [4]刘明宪:《播下失败的种子:试论台训班的成立及其困境》,赖泽涵、朱德兰编:《历史视野中的两岸关系(1895~1945)》,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207~247页;《日记中的历史:唐秉玄<日记簿>中的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近代中国》,第161期,第48~78页;《唐秉玄的台湾行政干部受训<日记簿>之史料诠释》,《台湾史料研究》,第34号,第55~94页。
- [5]杨光彦、陈明钦、张国辅:《台湾革命同盟会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 [6]陈云林主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12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350~352页。
- [7]陈云林主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16册,第161~163页。
- [8][9]秦孝仪主编:《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第169~172页。
- [10][32][33][34][35][37][38][41][43][44][45]陈云林主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4册,第174页,第203~208页,第180~187页,第201~202页,第33页,第103页,第73~74页,第89页,第105~146页,第203~208页,第180~182页。
- [11]1944年10月22日,中央训练团举行国父纪念周,陈仪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论及台训班之筹备经过。《复兴关》载云:“十月二十二日,国父纪念周于上午九时在本团大礼堂举行。出席全国官兵等二百余人。由陈教育长领导行礼后,即席讲话。讲述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筹备经过。略谓中央鉴于抗战胜利后,台湾即当收复,而收复后各项事业之筹划及其人才之准备均须极为注意。中央设计局曾设台湾调查委员会,从事调查工作,以供各项设计之参考。本团更奉令办理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从事行政干部之训练,以为各项人才之预备。”参见《复兴关》第236期,第1988页。
- [12]《各机关选送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学员注意事项》,陈云林主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4册,第67页。
- [13]《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学员甄选办法要点》,陈云林主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4册,第58~59页;《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学员招选办法》,陈云林主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4册,第63页;《各机关选送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学员注意事项》,陈云林主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4册,第67页。
- [14]《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学员招选办法》,陈云林主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4册,第64页。
- [15]《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学员招选办法》,陈云林主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4册,第63页。
- [17]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主编:《中国通史 21 第十二卷 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00页。

- [18]张宪文、方庆秋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7页。
- [19]陈云林主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2册,第2页。
- [20]陈云林主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19册,第383~384页。
- [21]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9页。
- [22][23][24][25][26][27][28][29][30][31][57]陈云林主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1册,第23~24、59~60页,第61~63、67、69页,第64页,第70、71、80页,第72~73、78页,第74~75页,第76~77、82~83页,第79、89~90页,第87~88页,第96~98、212~213页,第28页。
- [36]《中央训练团团刊》,第180~181期合刊,1943年6月5日,第1459~1460页;《中央训练团团刊》,第203~204期合刊,1943年11月13日,第1664页;《复兴关》,第245期,第2117~2118页。
- [39]陈云林主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4册,第70~72、77~78页;第25册,第65~76、97~98、104~107、114~118页;第28册,第57~63页。
- [40]陈云林主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2册,第290~291页、第343~345页。
- [42]《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第一期教、职、学员通讯录》,陈云林主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4册,第131~144页。
- [46]谢儒弟:《蒋介石的陪都岁月》,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年,第65页。
- [47]醒予:《参加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组:《连城文史资料》第9辑,1988年,第71页。
- [48]《复兴关》所载分组统计人数略有不同:民政组41人,财政金融组16人,教育组13人,工商交通组19人,农林渔牧组18人,司法组13人。参见《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独立中队学员报到人数简单统计表》(三十四年二月统计),《复兴关》第242期,1945年1月15日,第2071页。
- [49]《复兴关》所载台训班学员学、经历统计表为:高考及格者91人,国外留学者18人,大学文凭者75人,专科文凭者11人,中央警官学校2人,中央军官学校1人,其他1人。参见《复兴关》第242期,1945年1月15日,第2071页。
- [50]陈云林主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81册,第29~45页。另,《复兴关》载台训班学员的年龄分布情况为:26~30岁38人,31~35岁49人,36~40岁21人,41~45岁10人,46岁2人,平均年龄33.4岁。其中年龄最大者为张振汉、茅绍襄,均为46岁,年龄最小者为马谕纶,仅26岁。参见《复兴关》第242期,1945年1月15日,第2071~2072页。
- [51][52]陈云林主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5册,第27、28页,第28、29页。
- [53]秦孝仪、张瑞成:《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第138~189页。
- [54][55][56]许雪姬访问,曾金兰纪录:《柯台山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7年,第45~46页,第46~47页,第48~49页。
- [58]薛月顺编:《台湾省政府档案史料汇编: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时期(一)》,台北:“国史馆”1999年版,第2~6页。
- [59]陈云林主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81册,第29~45页;第206册,第54~70页。
- [60]此表为笔者根据《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收录的第一期台训班学员名单,在台湾人物志数据库、台湾当代人物志数据库中检索得出的数据基础上自制。

[责任编辑 蔡惠茹]

The Influence and Training Work of the Taiwan Reception Cadre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sistance War

Zhao Qinghu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Resistance War, the Taiwan Reception cadres training work mattered much in respect of state sovereignty and Taiwan's political stability after its recovery. On the eve of the victory of Resistance Wa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fered Taiwan Administrative Cadres Training program in Shajiaping, Chongqing in order to train the cadres to take over Taiwan. It had strict selecting standard and the selecting policies geared to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The cadres were young and their majors were mainly involved in industrial fields such as administration, communication, commerce, agriculture, animal husbandry, forestry and fishery. After Taiwan returned to China in 1945, some of them made takeover policies and founded Taiwan rebuilt association. And 104 members of the training class went to Taiwan for the reception work, and most of them took important positions,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reception and rebuilding work in Taiwan.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Resistance War; Taiwan Reception cadres; training; influence